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系列丛书



东南亚研究名著译介系列之六

侨汇 —— 现代中国经济分析

[日] 山岸猛 著
刘晓民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东南亚研究名著译介系列之六

侨 汇

——现代中国经济分析

[日]山岸猛 著
刘晓民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日)山岸猛著;刘晓民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5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ISBN 978-7-5615-4222-4

I. ①侨… II. ①山… ②刘… III. ①华侨—外汇—研究—中国 IV. ①F83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187 号

责任编辑:薛鹏志 董兴艳

封面设计:洪祖洵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21.5 插页:4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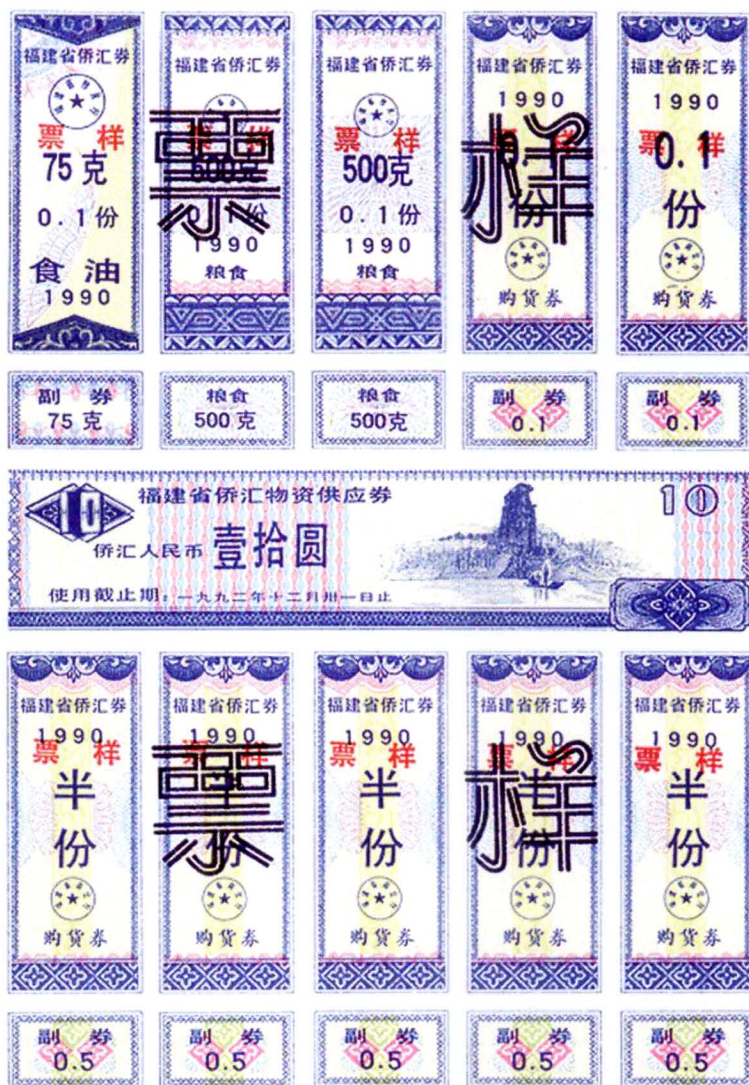
主 编:庄国土

副主编:王 勤 聂德宁(常务)

委 员:王 勤 庄国土 李一平 沈红芳

吴崇伯 陈福郎 林 梅 侯真平

聂德宁 蒋细定 廖大珂



侨汇物资供应券 (1)



僑匯人民幣壹拾元



侨汇物资供应券 (2)

中译本序

山岸猛教授的专著《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中译本付梓之前，著者约请我为之作序。我自知学识疏浅，亦非侨汇研究专家，内心惶恐难以完成托付，但我与著者相识多年，又怕辜负殷切之意，未敢婉辞。现仅就我拜读此书后的一点心得，就教于大家，并权作推荐之语。

顾名思义，侨汇就是来自海外侨民的汇款。中国使用的“侨汇”一词，指的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故乡亲友或团体组织汇寄的钱款。侨汇不仅是维持侨属侨眷生活的赡养费用和生产资金，也是国家非贸易外汇的重要来源，对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有重大作用。近代以来，侨汇一直是华侨华人与祖国之间的重要经济纽带，联系着海外侨胞与国内亲属，联系着海外华人与故乡，联系着华侨华人居住国与中国。侨汇的重要性，使它成为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长盛不衰的课题，也是中国侨乡和华侨华人居住地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甚至政界的关注。

日本在战前已重视侨汇的调查和研究。早在1914年，日本占据下的台湾银行调查课便完成了南洋华侨汇款状况的调查报告，并据此提出台湾银行向南洋地区扩张时应采取的对策。20世纪30年代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侨汇又作为南洋华侨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标志和抗日资金来源，在多册研究华侨的日文著作里出现。战后，侨汇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也有一些成果发表，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中国国际收支和华侨经济的日文论著，往往也涉及侨汇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以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为代表的近代亚洲经济史研究，以亚洲贸易圈和华侨网络论的宏观视野，研究侨汇对亚洲经济的作用和意义，将侨汇研究拓展到新的领域，十分可贵。但是，总的来看，战后发表的侨汇研究成果，在研究华侨华人课题的日文著述中所占分量很少。

中国学者对侨汇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断断续续有些成果，例如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通过20世纪30年代中期所作的侨乡

调查,详细论述了侨汇在华侨家庭和社会经济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此书曾被译成日文出版。20世纪40年代,郑林宽的《福建华侨汇款》、姚曾阴的《广东华侨汇款》相继出版,成为研究战前侨汇的重要基础资料。但从新中国建立直到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间,华侨研究被视为隐秘的内部研究,侨汇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乏善足陈。直到改革开放后,侨汇研究重新受到关注,学术界开始了较为全面地研究侨汇的时期,具体来说,在侨批资料的发掘整理、近代侨汇史和侨汇与侨乡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研究上,取得一定进展,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有林金枝、袁丁、林家劲等人。另外,海外华侨的汇款又与家信同寄,有款必有信,这些家书被称为“侨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华侨史、家族史的民间档案。近年来,作为侨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侨批的历史和独特价值的研究方兴未艾,《侨批档案》已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准备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从上述中、日的侨汇研究史来看,无论是战前或战后,都有一些研究侨汇的著述或调查报告问世,只不过其内容基本上局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而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侨汇问题研究,则断层迭现,尚有“未开垦的处女地”。日本秀明大学山岸猛教授经过长期的中国侨乡调查,于2005年出版的日文版《華僑送金——現代中国经济の分析》一书,正是论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侨汇发展变化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部侨汇研究专著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有以下可圈可点之处。首先,它是填补中国侨汇研究空白的力作。在扼要回顾侨汇历史之后,著者带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与侨乡经济活力有何关系的问题意识,以福建晋江、广东台山、浙江温州等著名侨乡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与侨汇的关系为主轴,考察了改革开放时代侨乡的资金、人口的动态变化,论述了改革开放后的侨汇数量变化与政策演变、新移民的关系,侨乡经济发展与侨汇的内在关系等诸多重要问题,颇具新意。其次,具有历史的、政治经济的、国际移民的多重研究视角。将侨汇研究置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和国际金融形势的大框架内,论述侨汇动态性变化及其“内”、“外”原因,为侨汇研究所仅见。再次,资料翔实鲜活,著者在侨乡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熟悉侨乡侨汇的来龙去脉,书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例如书中具体论及的“农转非”、“以物代汇”、“以钞代汇”、“民间信贷”等等,在同类研究中尚属少见。一个外国学者,为了一个专题的研究,在十多年里多次到中国进行侨乡调查,这种锲而不舍地做学问的态度亦令人感佩。该书出版后,得到日本学者的肯定,

有评论认为是“日本第一部真正研究侨汇的著作”。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主办的《南洋资料译丛》已选译部分章节发表,其观点和数据也被中国学者所引用。当然,正如中国古人所云,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依本人管见,这部著作如能在系统性和理论性方面进一步提升,会更有价值,凸显出更大意义。

现在,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资深日语翻译刘晓民教授执笔,将原著译成中文出版,既有补学术之功,又将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相信华侨华人研究工作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将会从中吸取营养、受到启发,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共同推动侨汇研究更上一层楼。

李国梁(郭梁)

2011年10月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自宅

中文版序

拙著《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日本论创社 2005 年版)已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季刊《南洋资料译丛》上作了部分介绍。在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以及《南方人口》、《八桂侨刊》等专业杂志和陆学艺主编的《晋江模式新发展——中国县城现代化道路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等著作也引用了本书的中译文(载《南洋资料译丛》)。

日本的代表性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刊物《亚洲经济》(2008 年 3 月号)刊载了本书的书评,并被几家学术刊物所引用,学界的研究人员对本书的关注还比较高。

此次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刘晓民教授将全书译成中文,并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感到无比的高兴。

汉语圈的人口比日语圈人口多,其地域也大得多。日语成为不了国际语,但汉语业已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今后汉语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将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出版,笔者感到十分荣幸。

笔者一直从事现代中国经济研究,并试图将侨汇作为一个切入点来阐明现代中国经济。

有关现代中国经济的日文著作以中文形式在中国出版甚为罕见。拙著的中文版能够在笔者的研究对象——中国出版,笔者感到极为高兴。也就是说,拙著将从日语圈这一狭窄范围转到汉语圈这一广域范围的读者手中。

日文版与中文版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个是在中文版中对日文版作了部分修改;另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日文版中没有“终章”,“终章”是专门为中文版写的。

看过“终章:21 世纪的侨汇与中国经济”,读者便会清楚,进入 21 世纪后,20 世纪 50—60 年代不过 1 亿至 2 亿美元的全中国侨汇,仅从公开发表数值的 2004 年来看便达到了近 150 亿美元,2005 年即骤增至 213 亿美元。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变化一样,侨汇(包括其用途等)也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但是,有关侨汇的资料并不多,而且偏重于某些地区,片断性的资料比较多。笔者期待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侨汇研究能够活跃并发展起来。

这里想说一下译者。刘晓民教授曾在日本的大学度过长期的研究生生活,日语水平很高,已在日本出版了几部辞典。刘晓民教授所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是中国研究华侨华人的代表性研究机构。该研究院发行有两本学术刊物——《南洋问题研究》(季刊)和《南洋资料译丛》(季刊)。刘晓民教授是两刊的编辑,对华侨华人研究当然有很深的理解。难得由精通日语、对华侨华人研究有深刻理解的译者翻译拙著,笔者深感荣幸。

在此还想感谢给拙著写了《中译本序》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李国梁教授。据笔者所知,李国梁教授是中国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之一。李国梁教授也曾经在大学的大学、研究机构做过两年以上的研究,是一位诚实温厚、德高望重的学者。笔者一直以来对他的真挚的研究态度甚感钦佩。李国梁教授爽快地答应笔者为本书写《中译本序》,在此深表谢意。

最后,笔者想把本书献给为中文版的出版最感到高兴、在作为临床心理师忙于工作的同时全身心地支持笔者研究生活的夫人妙子。

山岸猛

2011年6月

前 言

笔者想写这本书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侨汇是了解现代中国经济,尤其是侨乡经济,进而是华侨华人经济网络的重要领域,而有关侨汇的正式研究却难以看到;其次,笔者迄今发表的几篇论文虽然得到部分专家的首肯,^①但包括这几篇论文,笔者的许多论文均刊载于一般人不会光顾的专业刊物。在成书时,笔者在以往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加写了几章。笔者认为,本书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已经就现代侨汇的重要方面作了阐述。此外,本书中所用的“华侨”、“华人”与中国所用的“华侨”、“华人”的意思相同,即:“华侨”指拥有中国国籍,在国外居住的人;而“华人”则是持有外国国籍、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②关于港澳台居民的称呼,本书也按中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使用了“同胞”一词。

这里首先想写一下笔者从事侨汇研究的经历。为了研究侨乡,笔者开始走访侨乡,从那以后已有十二三年。从1992年至进入21世纪,笔者每年独自造访福建省、广东省的侨乡。每次访问时间长的有近半年,短的有2~3周,每年平均1个多月到访侨乡。在笔者开始研究侨乡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东、福建沿海的侨乡交通状况不好。在冷战时代的中国,为了备战,沿海地区(称为“第一线”)根据政策没有建设公路和工厂。到了后冷战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广东(珠江三角洲)、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的公路建设开始正式启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从厦门乘车至晋江单程(约110公里)需要5个小时左右。由于途中许多地方正在修路,不得不绕远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公路状况已经好转,从厦门到晋江乘出租车只需1小时左右,乘长途汽车也不足2小时。去广东省的著名侨乡台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情况也

① 请参照日本华侨华人学会编《华侨华人研究》创刊号(2004年9月)所载的滨下武志论文、李国梁论文,以及秋田、水岛编《现代南亚六 世界体系与网络》(东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所载的滨下武志论文等。

② 《辞海·国际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

大体一样。途中许多地方在修路,从广州乘车单程需要近 10 个小时,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走高速公路只需 3 个半小时左右了。

但是,不易采访侨乡的主要原因并非交通状况。笔者拜访过华侨华人相关机构,他们总说:“如果您是华侨,出于研究目的采访侨乡是很容易的,如果不是,没有特别的介绍信就很难成行。”为此,笔者采访侨乡时利用了中国旅行社,或者请位于侨乡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等帮忙。经过多次访问,许多人成了朋友,大大地支持了笔者的研究活动。

以往的研究采取了依据中国出版的报刊、图书分析现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形式,未能描述实际经济状况。侨乡经济研究与此不同,笔者每年都要去侨乡采访,而每次访问侨乡都有新鲜感,因此并没有为难以发现实际状况而感到焦虑。笔者不知道在本书中能够描述多少侨乡的实际状况,不过笔者基本上采取了以实地调查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姿态。

笔者想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以人员和资金为中心的侨乡的变迁,并挖掘其特征,阐明侨乡经济的活力对整体中国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资金的动态与人员的动态是相关联的。另外,还必须将侨乡的出国、出境情况纳入视野。笔者想要阐述现代中国整体的侨汇情况,了解两大侨乡省份——广东省、福建省的代表性侨乡的侨汇情况,因此多次前往广东省台山和福建省晋江、泉州、石狮,也多次访问了广东、福建的大学和有关华侨华人的政府机构等,还拜访了北京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然,笔者是在摸索的状态下开始研究的。为了考察侨乡经济的实际状况,1993 年在汕头大学呆了 1 个月,弄到了两年左右的《汕头日报》;1 个月后又 在泉州弄到了 3 年左右的《泉州晚报》。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背着这些报纸走到邮局,邮局职员在检查时说:“地方报纸也许不能寄往日本。”我想,如果能寄到,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便寄了出去。遗憾的是,回国后,从侥幸寄达的这些报纸中并没有找到很多对考察具体状况有用的内容。此后,为了找到有用的资料,每当访问该地,就顺便到报社、侨办等看看。

当然,也有日本研究人员关心现代中国的侨汇情况,但正规的研究几近空白。其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缺乏资料。

在中国,有关现代中国侨汇的研究也不多,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林金枝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只有 2~3 名。代表性学者林金枝教授的侨汇研究仅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林教授大概是第一个阐明以往没有系统阐述的 1950—1988 年整个中国侨汇问题的学者。他对侨汇研究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有关改革开放后侨乡经济发展与侨汇(包括捐赠等)的关系,以及侨汇对

侨乡金融结构的影响等的研究仍是空白。这些问题在中国似乎也没有人进行正规的研究。其原因之一是人们常说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为了不在政治运动中挨批,知识分子避免进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华侨华人”问题,人们认为是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有海外关系”这句话在“文革”时期常被用作“海外间谍”之意。国内的侨眷也受到批判和歧视。有关侨汇史的研究比较多,但有关现代中国侨汇的研究则很少。

改革开放时代是邓小平带来的。即使“对外开放”的“外”主要表示海外华侨华人、海外同胞的时代已经到来,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国内亲属的联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海外华侨华人、海外同胞与国内亲属之间的纽带是长期来自海外的汇款、捐赠、书信等。但有关其具体情况资料当时还很难找到。

对侨汇进行研究,只有不断地前往当地(侨乡),持之以恒,并保持对调查研究的热情,才能逐步地进行积累。

1995—1997年的三年间,笔者曾与几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人员进行题为“侨乡经济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合作研究。这里想记述一下当时写在报告书中的“序言”的部分内容。

最初想要进行侨乡研究,是因为笔者十分关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对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想要对支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大陆侨乡的经济联系进行调查研究。对外开放前有关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联系的先行研究自不待言,对外开放后该领域的研究也很少。资料方面也受到诸多限制。

海外华侨华人与他们的侨乡亲属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依靠侨汇。但通过访问侨乡,很快就知道相关资料基本上没有公开。因为如果中国公布这些资料,往往会给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带来麻烦。例如,居住在印尼的华人是印尼公民。印尼政府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号召印尼公民优先在本国投资、储蓄。但是,居住在印尼的华裔印尼人如果不向本国印尼投资,而向祖国中国汇款和投资,印尼政府就会感到不快。这样,便会出现政府对华侨华人实行各种限制的可能性。政府乃至原住民的“排华运动”以前也发生过几次。这种状况在众多华侨华人居住的东南亚各国基本上都存在。

以上是外因,以下是内因。在改革开放前政治运动还很激烈的时期,领取侨汇的华侨华人、海外同胞的中国国内亲属被批为“有海外关系”,侨汇被批为“剥削所得”或“特务经费”。

侨汇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不必归还的、重要的非贸易外汇收入。但是，每当发生政治运动，领取侨汇的国内亲属在“群众运动”中就会受到批判。于是他们不希望公开侨汇。这种社会形势使得中国政府不能或不公开资料。对外开放后，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亲属或侨乡的交流情况逐渐为人所知。但是，还有很多情况有待今后公开。进一步说，不去当地（侨乡），就不能弄清具体情况，但当时还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田野调查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只能不断地与当地的普通群众、华侨华人相关机构及专家等进行交流，积累资料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的联系是很深的。下面来看看大体的情况。

从全国来看，1979年至1990年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对祖国大陆的投资为115.2亿美元（其中来自港澳地区的资本约为111.6亿美元），其后又进一步增加，至1997年12月，外国企业的投资合同额累计达5211.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218.7亿美元，其中60%~70%是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资金。^①

广东省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侨乡，福建省被称为中国第二大侨乡。就这两个省来看，广东省自1979年改革开放至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811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6.6%，其中港澳资本和华侨华人资本占了80%。此外，广东省1978年至1987年收到的侨汇达到了26亿美元。其后10年，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直接带回广东省的外汇额比过去10年期间的侨汇额还要多。

此外，1978—1997年广东省各地批准接受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款赠物总值达150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学校、医院、养老院、公路等公益事业。^②

下面来看看福建省的情况。2004年春，福建省已有2万多家侨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的70%以上，全省“三资”企业实际到资425亿美元，其中侨资企业占一半以上。^③

据福建省侨办主任黄少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至2004年春，华侨华人在

① 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② 吴行赐：《邓小平侨务思想与广东侨务工作实践》，《华侨与华人》1998年第2期，第9页。

③ 《福建侨报》2004年5月14日。